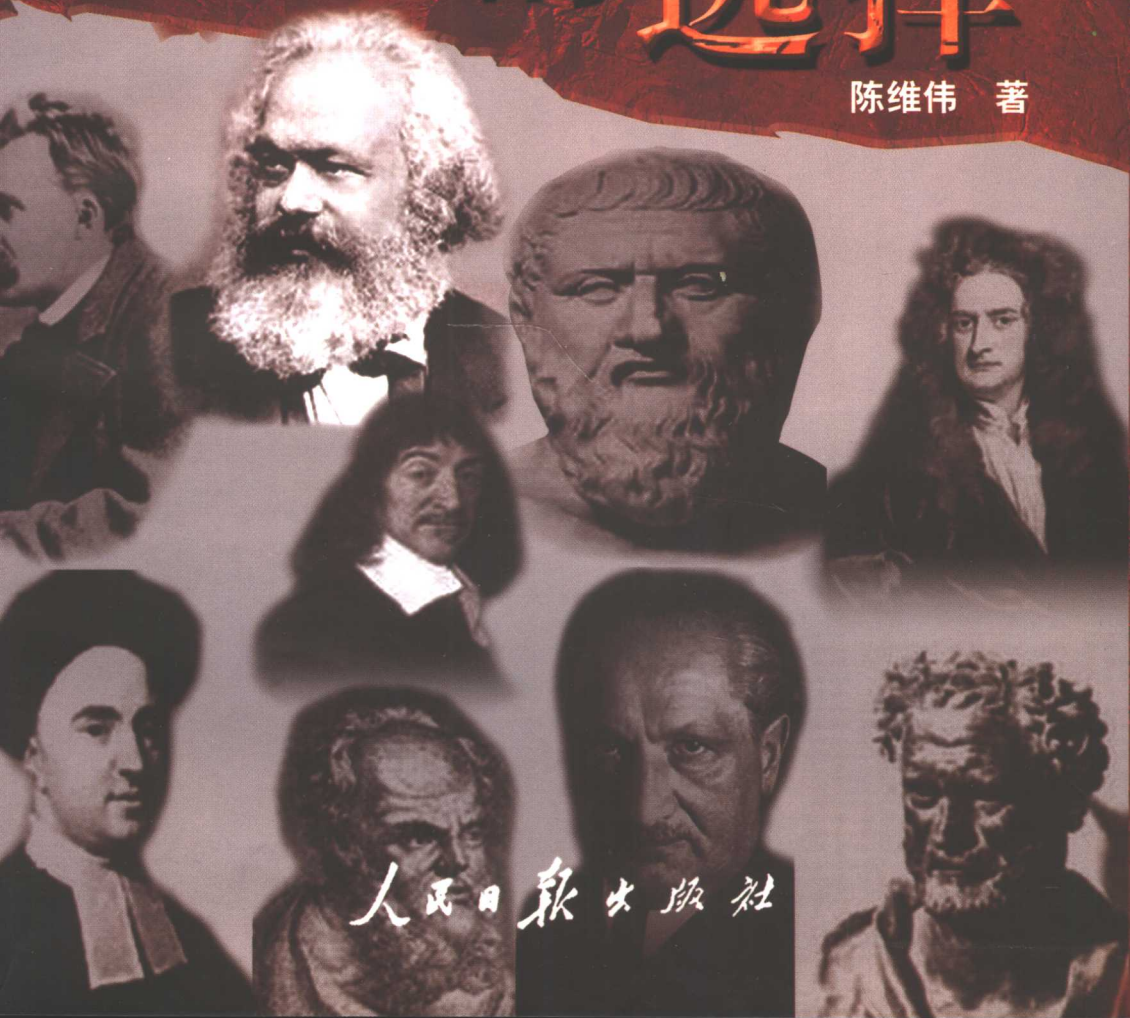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信仰的选择

陈维伟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信仰的选择

陈维伟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信仰的选择/陈维伟著. -北京: 人民日报出版社,
2006.7

ISBN 7-80208-375-3

I. 信… II. 陈… III. 信仰-研究-中国-现代
IV. B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73785 号

书 名: 信仰的选择

作 者: 陈维伟

责任编辑: 张亚平

装帧设计: 海马书装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政编码: 100733

发行热线: (010) 65369527 65369529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大地印刷厂

开 本: 650 × 970mm 1/16

字 数: 190 千字

印 张: 14.875

印 数: 7000

印 次: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208-375-3/D.099

定 价: 19.80 元



序 言

魂,人类之灵魂,民族之精神。人若失魂,如“行尸走肉”;民族失魂,则“外强中干”。

21 世纪,必是古老中国从沉睡到猛醒、再到腾飞的世纪。

然而,“腾飞”意味着什么?难道仅仅是 GDP 的翻倍、人造飞船的升天、高楼洋房的林立、亿万人口的丰衣足食?

的确,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;但是,绝非仅仅如此。

中华民族要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巨人,不仅要有强壮的体魄,更要有宏大的精神——这就是我们的民族之魂。

《信仰的选择》一书恰恰抓住了这样一个时代的课题,发出时代的呐喊——“21 世纪的中国人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信仰?”

笔者是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,在吉林大学主攻哲学专业,从而打下了一定的哲学功底;毕业后继续深造,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新闻专业,获硕士学位后,分配到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,从普通记者、编辑起步,逐步担任版面主编、编辑组长、部门副主任;1999 年,调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《紫光阁》杂志社,任总编辑。20 多年的新闻工作生涯,使笔者比较全面、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现实社会,并取得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。

此书是笔者多年来研究探讨当代中国哲学与现实问题的成果,既有用哲学思维洞察今日世界的思辨性,更有解读当代社会信仰问题的现实性。其中,笔者提出“信仰的五大要素”、中国现





实社会的“多元文化”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“再认识”，都是近年来笔者在理论上的最新探索；再有，笔者对于信仰与哲学、信仰与神学、信仰与灵魂、信仰与真理、信仰与善恶、信仰与修身、信仰与待人、信仰与成事等关系，都作了有益的探索，希望能给人启迪。

此书的素材大多是由笔者的读书笔记、学习札记、刊载文章、讲演提纲等汇集整理而成，也许会造成体例上的不够工整，但愿这一缺憾之处，不会影响和破坏全书的基本逻辑和框架。此书各章节可以单独成篇，也许会令读者阅读起来更加轻松、随意。

此书愿奉献给一切关心我们民族未来的朋友，奉献给一切不断充实自己精神世界的朋友，奉献给一切愿心灵更加美好的朋友！

本书作者写于2006年夏





目 录

序 言	I
第一篇 信仰危机与信仰重建	1
如何把握信仰问题	1
如何分析信仰危机	17
如何进行信仰重建	29
第二篇 信仰问题的哲学思考	41
信仰与哲学	41
信仰与神学	50
信仰与灵魂	67
信仰与真理	80
信仰与善恶	96
信仰与修身	110
信仰与待人	121
信仰与成事	137



第三篇 信仰与多元文化	153
三元色: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辨析	153
多元文化之一:保守主义(传统思潮)	164
多元文化之二:自由主义(西方思潮)	184
多元文化之三:激进主义(浪漫思潮)	195
第四篇 人类当代的最高信仰	204
走近马克思	204
重读马克思	209
捍卫马克思	225
后 记	230



* 第一篇 *

信仰危机与信仰重建

如何把握信仰问题

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——中国，经过鸦片战争以来的血雨腥风，经过无数志士仁人的艰苦探索，我们找到了走向民族昌盛富强之路——社会主义道路。实践给了我们中国人唯一正确的信仰选择，这就是共产主义。

共产主义是一个远大理想，也是一个现实的运动，更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。

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、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都是我们的指导思想，都是我们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。

对于我们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的光辉理论——马克思主义，对于我们的远大理想——共产主义，对于我们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—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我们的信念是否坚定？能否自觉将其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？

——这些问题关系重大，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民族能否真正发展壮大，能否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为什么信仰问题这么重要？可以说，一个民族没有统一的、



坚定的信仰，就没有美好的前途和未来；一个人没有积极的、科学的、正确的信仰，也会迷失方向、走上歧途。信仰，既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、精神寄托和精神动力，也是奋斗目标和行动指南。

世界上的信仰五花八门，要正确地把握和确立自己的信仰，我觉得可以从五个要素来认识：

1、信仰的坚定性

坚定性是信仰的第一特征，它的对立面是怀疑和动摇。作为共产党员，作为当代中华优秀儿女，首先要坚定自己的理想信念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，要经得起风浪的考验，不能有点风吹草动就摇摆不定。

2005 - 2006 年，全党范围开展大规模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，不是党中央领导一时的心血来潮，可以说酝酿已久。其中，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，也有一个比较直接的原因，就是若干年前，有关部门组织了部分党员的问卷调查，问卷中有些题目涉及共产党员的理想和信念问题，结果答案出人意料，相当比例的党员明确回答：对党、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。还有的表示，如果能再次选择是否入党，就持否定态度。这一调查结果，引起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，下决心要搞一次全党范围的思想教育。因此，这次教育活动，把理想信念问题放到很重要的位置。

理想信念是世界观的核心。我们试想，一个共产党员，连最根本的理想信念都丢掉了，他的世界观能是正确的吗？他的言行能没问题吗？即使表面做得不错，动机也是不纯的。如果这类共产党员越来越多，长此以往，我们的党怎么还能有凝聚力和战斗力？我们党历史使命怎么还能够实现呢？

这次先进性教育，党中央把“理想信念”的问题提得很重：提高党员素质，作为第一个目标，就强调这个内容；剖析思想根源，首先要剖析世界观，而世界观的核心就是理想信念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政治信仰、政治理想，这是信仰的最高级态。共



产主义的信仰是人类最崇高的信仰，更是我们共产党人和当代中华优秀儿女要坚守的信念。中国传统文化讲“体、相、用”，“体”就是内在素质，核心是信仰；“相”是指实践、表现、作为；“用”是指效果。如果一个人的内在素质出现问题，表面行为一时可能看不出来，但决不会坚持长久，更不会有长效。

一个共产党员，如果思想素质不高，理想信念不坚定，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先进性，关键时刻就更会出现问题。

这里，我想举一个共产党人理想坚定的正面例子：中央电视台有个栏目，叫作“永远的丰碑”，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期间，播出300多期，其中介绍了一位烈士，红军的著名将领，名叫段德昌，事迹非常感人，但播出时间有限，没有详尽介绍。

段德昌是我们党著名的军事家，湖南人，曾介绍彭德怀同志入党，参加过“八一”南昌起义，牺牲前任红三军第九师师长。1933年1月，红三军强攻湖南桑植（张家界附近），失利后退回湖北鹤峰。这本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所致，但湘鄂西中央分局负责人夏曦独断专行，利用“肃反”运动，给段德昌强加上许多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说他“故意打败仗”，还说他“企图分裂红军”，当年5月1日段德昌被所谓的“肃反委员会”杀害。

段德昌临刑前曾把明朝诗人于谦的《石灰吟》用石块刻在牢房的墙壁上：“千锤百凿出深山，烈火焚烧只等闲；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”

据说，公审大会上，段德昌双手反绑着，被押在台上。在宣布判处段德昌死刑后，军长贺龙匆匆赶来，警卫员端着一个木盘，木盘上放着一碗酒和几样小菜。贺龙端起酒，送到段德昌面前，说：“德昌，军长无能，不能保住你的性命。一碗包谷酒，算是为你饯行。”他喝令卫兵为段德昌松绑。段德昌接过酒碗，一饮而尽。他眼含泪花对贺龙说：“胡子，我不怪你。”贺龙问：“德昌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”

段德昌镇定地对贺龙和指战员说：“我说三句话：第一，



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。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，将来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。第二，红三军已濒临绝境，这里地瘠民稀，没有粮食，必须回洪湖。第三，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，用刀杀我吧，子弹宝贵，留下子弹打敌人。”最后还是惨遭枪决，年仅29岁。

就这样，我们党的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倒在自己人的枪口之下，但他至死对党、对革命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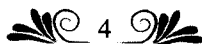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，中共中央为段德昌等被左倾错误迫害致死的同志恢复名誉。1952年，毛泽东主席给段德昌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一号烈士证。

应该说，在我们党的历史上，有数不清的英雄和先烈，都是理想坚定的共产党人。实践证明，理想信念，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支柱；失去信仰或动摇信念，就会与党离心离德，就等于在思想上脱离了党组织。我们相信，通过这次先进性教育，每个共产党员都会在理想信念方面有一个新的提高和认识的升华。

2、信仰的超越性

信仰不是对客观世界被动的认知和认可，“吃饱了混天黑”、“上班挣钱混日子”都不是信仰，信仰是一种主动的“超越”，是理想对现实的精神超越。

所谓“超越”就是一种境界。人的最小境界是纯粹的自我，是眼下的自我；当你想到自我的发展、自我的完善，你就开始超越自我；当你考虑到别人、照顾到别人，也许首先是亲人，然后再推及到外人，你就又跨了一大步，变得高尚起来；如果你考虑到集体、民族、国家、社会的利益和前途，你就有了社会责任感；如果你能为了实现集体的、民族的、国家的、乃至人类社会的利益，而牺牲自己的私利，你就有了崇高的理想。最后这种境界正是古往今来无数志士仁人的思想境界，更是我们共产党员必备的境界。





我们中国人讲“义”，讲“义举”。我们孝敬父母，关爱自己的亲人，是义举；我们关爱他人、资助他人，更是义举；但还有更大的义举，这就是为集体、民族、国家乃至全人类贡献自己的一切，甚至生命。这就是大义。可以说，“义”是对私利的超越；大义由小义培养、积累而成；小义服从大义，同时，没有小义做基础的大义是虚伪的、空洞的。

共产党员的精神境界是“大义”，也是从一点一滴培养而成的。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共产党人的情感应该是包含着儿女亲情的、人类最崇高的情感。孔繁森的事迹就证明了这一点。

1994年，孔繁森因公去世后，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有关部门，立即要求组织大规模宣传，并直接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记者，当时我是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参加采写任务的。

孔繁森的事迹家喻户晓，最主要的事迹是三次援藏：第一次，1979年，时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主动报名到西藏工作，三年后返回家乡；第二次，1988年，已担任聊城副专员的孔繁森再次被选派进藏，任拉萨市副市长，一干又是5年；第三次，1993年，孔繁森进藏工作期满，但他主动表示继续留在西藏，而且担任最艰苦的地区——阿里地区的党委书记。大家是否知道，阿里地处西藏西北，平均海拔4500米，气温长年在零摄氏度以下，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摄氏度，高寒缺氧，气候恶劣，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刮着7至8级大风，被当地人称作“西藏的西藏”，他在那里直到去世将近两年时间。这三次合起来，孔繁森在西藏共有10年的经历。1994年11月29日，他在去新疆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，不幸遭遇车祸，以身殉职，时年50岁。这里仅讲三件事：

其一，孔繁森是个大孝子。平时只要工作不忙，总要抽空与老母亲聊聊天，与妻子争着照顾老人家。1988年要参加第二次援藏时，孔繁森的老母亲已经87岁了，因为生病，常年瘫痪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。孔繁森的妻子儿女都希望他留在山



东工作，孔繁森也渴望留在老母身边照料老人；但想到西藏更需要党的干部，他毅然表示服从组织安排。

临走那天，孔繁森默默走近母亲床边，呆了好半天，也说不出口，最后才轻声地说：“娘，儿子又要出远门了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要翻好几座山，过好多条河。”老母亲心里特明白，一把拉住孔繁森的手说：“不去不行吗？”孔繁森强忍泪说：“不行啊，娘，咱是党的人。”老母亲特别厚道、特别通情达理，也知道儿子的心情，就说：“那就去吧，公家的事误了不行。多带些衣服干粮……”

听到这句话，孔繁森再也控制不住了，一下跪在地上，给母亲磕了一个响头，说了一句：“自古忠孝难两全，娘，您多保重！”眼泪哗哗直流。后来，他对朋友说：我七尺大汉，一生中只跪过这一次。

孔繁森来到西藏，每当夜深人静孔繁森总会想起在千里之外的家人，对着房顶犯愣，有时放下女儿的电话也很长不说话。为了援藏事业，孔繁森把对自己亲人的感情深埋在心底。

其二，孔繁森是极讲卫生的人，有的朋友取笑他有“洁癖”，平时闻到羊膻味就恶心。可是，他到藏胞家作客时，遵照藏族习俗，拿起风干的生羊肉就吃，有时出门就呕吐；他终日奔波在雪山高原，没有净水，就抓起大把大把的雪来解渴。

一年冬天，孔繁森到拉萨的一所敬老院探望老人，当走到一位叫琼宗的老人面前时，发现老人脚上穿的鞋子破了，而且很单，孔繁森弯下腰去，脱下老人脚上的鞋子，发现老人的脚冻得又红又肿，他非常心痛，一下子把老人的脚放在自己的怀里，用体温去焐热老人冻僵的双脚，后来又托人给老人送去一双新棉鞋。

孔繁森曾经当过医生，每次下乡，都要带着自己掏钱买的药品，为农牧民治病。一次有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肺病发作，浓痰堵塞喉管，十分危急。由于没有必要的医疗器械，孔繁森毅然将听诊器的胶皮管伸进老人嘴里，对着胶皮管用嘴一口一口



地将痰吸了出来，老人这才转危为安。

其三，孔繁森一生没有任何积蓄，有了钱很快就花光，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钱是他救济了别人。他曾收养三位藏族孤儿，为了抚养他们孔繁森曾三次到西藏军区医院卖血，共900毫升。一次探家时，从家里7070元存款中取走7000元，买药品给藏民看病。

孔繁森去世后身上只有三件遗物：8.6元钱、一个破旧的收音机和四张稿纸——去世前10天在赴新疆塔城的途中写的“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”的草稿。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少得可怜却又价值连城的全部遗产。

孔繁森有两句话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广为流传：“一个人，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；一个共产党员，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。”他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

我们今天学习孔繁森，就要学习这种境界。

当然，树立崇高理想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，要靠平时一点一滴的修养。孟子有句名言：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他说，这种气“至大至刚”，充满于“天地之间”，但要与“义”和“道”相融合，否则就没有气势。培养时，不能有功利的目的，急于求成，否则就会“拔苗助长”，事与愿违。

我们共产党人树立自己的信仰，培养高尚的情操，也要从点滴做起，绝不能满足于虚无缥缈的高谈阔论。实际上，我们从有些贪官的案例来看，有些领导干部连最起码的做人道理和礼仪廉耻都不懂，甚至是乱人伦、逆人道，禽兽不如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已被查处的贪官95%有情妇，60%以上“包二奶”，广州、深圳、珠海等地的比例更大，抽样调查102例贪污受贿案，被告100%有“包二奶”的行为。

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“两会”提出“八荣八耻”十分必要，其中第八条，就是“以艰苦奋斗为荣、以骄奢淫逸为耻”。“骄奢淫逸”这四个字是所有贪官的重要特征，我们反腐倡廉、净化心灵、坚定信念，就要从倡导艰苦奋斗、反对骄奢淫逸开始。



3、信仰的终极性

人的一生有许多美好的愿景，也有不同层次的追求。信仰不是一般的愿景和追求，比如想上个好大学、找份好工作、培养个好孩子等等，都算不上信仰，信仰是一种终极理念，也就是最高价值和最高追求。

所谓“终极理念”，是指信仰作为精神境界的核心部分，决定着一个人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以及人们对生活的基本态度。所谓“核心”，就是儒家讲的“里仁”，是“核”，是中心理念，别的观点都围着它转。所谓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。信仰，反映一个人的本性，树立难，破坏也难；破坏了再树立，就更难。

与一般的科学和常理不同，无论是哲学意义的信仰、还是宗教意义的信仰，都追求终极理念。

裴多菲有首诗：“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抛。”说明生命比一般的东西更有价值，爱情胜过生命的价值，而在自由的理想面前，生命和爱情又显得微不足道了。“自由”，就是裴多菲的“终极理念”。

中国南宋的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临刑时候，留下衣带赞，说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？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！”真是千秋凛然。他死后，他的敌人忽必烈说他是“真男子”！“仁至义尽”，就是文天祥的“终极理念”。

我们共产党人信仰共产主义，就是要把它作为“终极理念”，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文稿里，用崇高理想充自己的“门面”；真正的共产党人要为了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，能够抛弃自己一切。

我们剖析有些贪官的心理，看来是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当“门面”了，在他们那里“门面诚可贵，官位价更高，若为金钱故，一切都可抛。”最后连脑袋都丢了。



胡长清是新中国第一个被枪决的省部级贪官。他出生在湖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家境相当贫寒。少年时代靠放牛、割草、砍柴，来补充学杂费的不足，贴补家里买油买盐。1968年当兵，三年后提干，转业后上大学，毕业后一路高升，从科、处、局，一直干到江西省副省长。也许正是仕途畅达、官运亨通的顺境，对于还没有完成修身养性、磨砺品行的胡长清来说，恰恰引发了欲望的洪水，在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力后，他倾心于“傍大款”，热衷于疯狂“捞钱”，迷恋于猎取美色，在个人主义、拜金主义、享乐主义的邪路上越走越远，堕落成为一个政治上与党离心离德、经济上贪得无厌、生活上腐化糜烂的腐败分子，最终撞上反腐败的枪口。

案发后胡长清谈到自己堕落的原因时说：“看到人家下海了，手头有钱花；接触了一些有钱人和做生意的老板，看人家生活得很自在，自己开着豪华小轿车，出入高档酒店，穿的是名牌，喝的是洋酒，吃的是佳肴，身边还带着陪伴小姐，心里有几分羡慕。可想自己从政，身份不允许，条件也不具备，思想上先忍着。”一句“先忍着”，道出了隐藏在胡长清内心深处是非颠倒、美丑不分的肮脏观念。当有了追寻一己之利的机会，胡长清自然会肆无忌惮地索贿受贿，以便把“先忍着”的观念变为现实。

为了及早把心中“先忍着”的观念变为现实，胡长清有着明确的打算，这就是刻意与大款老板结交，从而享受“自在”的生活并聚敛钱财。他在担任省长助理时对一些大款老板吹嘘说，我“年轻有为，政治上前途无量”，“现在我花你们几个钱，今后等我当了大官只要写个纸条，打个电话，你们就会几百万、几千万地赚。”胡长清的几句话既将贪婪的心态暴露无遗，也将“索贿经”说得一清二楚。胡长清收受、索取财物的18个对象中就有15人是集团公司总经理、董事长、港商、私营企业主等重量级的“大款”。胡长清与他们拉拉扯扯，称兄道弟，就是看中了他们兜里有钱。而这些人则是心怀鬼胎，



看中的是胡长清手中有权。他们出手阔绰，多则数百万元，少则十几万元、数万元数给胡长清，就是用金钱铺路，以牵着贪钱的胡长清的鼻子走，利用胡长清攫取更大的利益。

从掌握的证据中查明，胡长清受贿是从一台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开始的，收受的第一笔贿赂款是2万元人民币，但他后来的胃口越来越大，一次受贿的数额即达60多万港币，再送给他几万元人民币已看不上眼。法庭调查他收受饲料公司老总送来的4.5万元贿款一事时，他居然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：“那点小钱，我根本就没有记它。”

胡长清的败露很有故事性，事情发生在我国政府1999年主办的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期间。8月6日是江西馆日，胡长清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后，次日突然失踪。

作为一名副省长，胡长清率团赴昆明公干期间外出不请假不报告，擅离职守，已经违反了组织纪律，这对一个高级干部来说，不是件小事；再加上他出行入住均使用假证件，胡长清的反常行动引起了中央的注意。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，中央纪委和中组部立即组织联合调查组，对胡长清的问题进行审查。

按调查组的要求，胡长清从广州被直接带到了北京接受审查。一开始审查，有两个女人就走进了调查组的视线。胡长清在广州期间曾用手机与两个女人通话，后来查明，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孙某某，另一个则是他的情妇胡某。而胡长清神秘的广州之行便是要替胡某办理调动工作的手续。在随后的监控中，调查组发现胡长清的妻子孙某某正在仓皇转移银行存款，调查组当机立断给予扣押，一清点发现竟有300多万元之巨。

巨额银行存款刚被扣押，调查组又从胡长清身上的一枚白金领带夹，牵出了一个关键的行贿人周雪华，并且在周雪华别墅的保险柜里面，查获了他替胡长清存放的100多万元。

两笔扣押查获的款项加起来达到了400多万元，凭胡长清正常的工资收入，是根本不可能积攒起来的。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